

以杭州为例 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

王国平

提要：长期以来,南宋被认为是一个国力弱小、对外以妥协屈辱贯穿始终的朝代,它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社会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则常被忽视。2007年“南海一号”沉船发现事件,引发了作者对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方面的研究与思考,试图对南宋作出较为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进而确立南宋的历史地位及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中的积极影响和巨大推动作用,以求还原一个历史上的真实南宋。

关键词：南宋 历史地位 文明进程

作者王国平,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杭州 310026)

2007年12月22日,举世瞩目的我国南宋商船“南海一号”在广东阳江海域打捞出水。根据探测情况估计,整船金、银、铜、铁、瓷器等文物可能达到6万—8万件,据说皆为稀世珍宝。迄今为止,全世界范围内都未曾发现过如此巨大的千年古船。“南海一号”的发现,在世界航海史上堪称一大奇迹,也填补与复原了南宋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一些空白。不少专家认为“南海一号”的价值和影响力将不亚于西安秦始皇兵马俑。这艘沉船虽然出现在广东海域,但反映了整个南宋经济、文化的繁荣,标志着南宋社会的开放,也表明当时南宋引领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作为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的都城临安(浙江杭州),则是南宋社会繁华与开放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以临安为代表的南宋的繁荣与开放,就不会有今日“南海一号”的发现;而“南海一号”的发现,也为我们重新审视与评价南宋,带来了最好的注解、最硬的实证。

提起南宋,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长期以来,不少人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曾写在临江城一家旅店墙上的诗,当作是当时南宋王朝的真实写照。虽然近现代已有海内外学者开始重新认识南宋,但相当一部分人仍认为南宋军事上妥协投降、苟且偷安,政治上腐败成风、奸相专权,经济上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生活上纸醉金迷、纵情声色,总之,南宋王朝是一个只图享受、不思进取的偏安小朝廷。导致这种历史误解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人们对患有“恐金病”的宋高宗和权相秦桧一伙倒行逆施的义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决不能坐在历史的成见之上人云亦云。只要我们对历史负责、对时代负责、对未来负责的精神和科学求实的态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南宋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将南宋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放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放到

参见《“南海一号”成功出水》一文,载《人民日报》2007年12月23日第2版。

(南宋)林升:《题临安邸》,转引自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帝王都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页。

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中进行考察,就不难发现南宋时期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国计民生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就不难发现南宋对中华文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此对南宋作出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

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军攻陷北宋京城开封。次年三月,俘徽、钦二帝北去,北宋灭亡。同年五月,宋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赵构,在应天府(河南商丘)即位,是为高宗,改元建炎,重建赵宋王朝。建炎三年(1129)二月,高宗来到杭州,改州治为行宫,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此时起,杭州实际上已成为南宋的都城。绍兴八年(1138),南宋宣布临安府为“行在所”,正式定都临安。自建炎元年(1127)赵构重建宋室,至祥兴二年(1279)帝昺蹈海灭亡,历时153年,史称“南宋”。

我们认为,研究与评价南宋,不当仅仅以王朝政权的强弱为依据,而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以人们生存与生活状态的改善作为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许多人评价南宋,往往把南宋王朝作为对象,我们认为所谓“南宋”,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王朝的称谓,而主要是指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的进步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过程,“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未来理想社会“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目标。这就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人的生存与全面发展作为评价一个历史阶段的根本依据。南宋时期,虽说尚处在封建社会的中期,人的自由与发展受到封建集权思想与皇权统治的严重束缚,但南宋与宋代以前漫长的封建历史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所出现的对人的生存与生活的关注度以及南宋人的生活质量和创造活力所达到的高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研究与评价南宋,不当仅仅以军事力量的大小作为评价依据,而应当以其社会经济、文化整体状况与发展水平的高低作为重要标准。我们评判一个朝代,不仅要考察其军事力量的大小,更要看其在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两宋立国320年,虽不及汉唐、明清国土辽阔,却以在封建社会中无可比拟的繁荣和社会发展的高度,跻身于中国古代最

辉煌的历史时期之列。无论是文化教育的普及、文学艺术的繁荣、学术思想的活跃、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是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南宋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当时世界上也都处于领先地位。著名史学家邓广铭认为“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研究与评价南宋,不能仅仅以某些研究的成果或所谓的“历史定论”为依据,而应当以其在人类文明进步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作为重要标准。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国祚最长的朝代,也是封建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南宋虽然国土面积只有北宋的五分之三左右,却维持了长达153年(1127—1279)的统治。南宋不但对中国境内同时代的少数民族政权和周边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对后世中华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认为:“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也曾经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南宋王朝负面的影响,更要充分肯定南宋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影响,只有这样,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

一、在政治上,不但要看到南宋王朝外患深重、苟且偷安的一面,更要看到爱国志士精忠报国、南宋政权注重内治的一面

南宋时期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外患严重之至,前期受到北方金朝的军事讹诈和骚扰掠夺,后期又受到蒙元的野蛮侵略,这些矛盾长期威胁着南宋政权的生存与发展。在此情形下,南宋初期朝廷中以宋高宗为首的主和派,积极议和,向女真贵族纳贡称臣,南宋王朝确实存在消极抗战、苟且偷安的一面。但也要承认南宋王朝大多君王始终怀有收复中原的愿望。南宋将杭州作为“行在所”,视作“临安”而非“长安”,也表现出了南宋统治集团不忘收复中原的意图。我们更应该看到南宋时期,在153年中,涌现了以岳飞、文天祥两位彪炳青史的“民族英雄”为代表的一大批爱国将领和数百名爱国仁人志士,这是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难以比拟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9页。

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载《学衡》第13期,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

《陈寅恪先生文集》第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页。

同时,南宋政权也十分注重内治,在加强中央集权制度、推行“崇尚文治”政策、倡导科举不分门第等方面均有重大建树。其主要表现在:

1. 从军事斗争上看,南宋是造就爱国志士、民族英雄的时代

南宋王朝长期处于外族入侵的严重威胁之下,为此南宋军民进行了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斗争,涌现了无数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爱国事迹和民族英雄。因而,我们认为:南宋时代是面对强敌、英勇抗争的时代。众所周知,金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匈奴、突厥、契丹以后一个十分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并非昔日汉唐时期的匈奴、突厥与明清时期的蒙古可比。金军先后灭亡了辽朝和北宋,南侵之势简直锐不可当,但由于南宋军民的浴血奋战,虽屡经挫折,终于抵挡住了南侵金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在外患深重的困境中站稳了脚跟。在持久的宋金战争中,南宋的军事力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逐渐壮大起来。南宋后期的蒙元军队则更为强大,竟然以20年左右的时间横扫欧亚大陆,使全世界都为之谈“蒙”色变。南宋的军事力量尽管相对弱小,又面对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蒙元军队,但广大军民同仇敌忾,顽强抵抗了整整45年之久,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抗击蒙元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南宋是呼唤英雄、造就英雄的时代。在旷日持久的宋金战争中,造就了以宗泽、韩世忠、岳飞、刘锜、吴玠、吴玠兄弟为代表的一批南宋爱国将领。特别是民族英雄岳飞率领的岳家军,更是使金军闻风丧胆。在南宋抗击蒙元的悲壮战争中,前有孟珙、王坚等杰出爱国将领,后有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张世杰等抗元英雄,其中民族英雄文天祥领导的抗元斗争,更是可歌可泣,彪炳史册。

南宋是激发爱国热忱、孕育仁人志士的时代。仅《宋史·忠义列传》,就收录有爱国志士277人,其中大部分是南宋人。南宋初期,宗泽力主抗金,并屡败金兵,因不能收复北宋失地而死不瞑目,临终时连呼三次“过河”;洪皓出使金朝,被流放冷山,历尽艰辛,终不屈服,被比作宋代的苏武;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诗句,表达了他渴望祖国统一的遗愿;辛弃疾的词则抒发了盼望祖国统一和反对主和误国的激情。因此,我们认为,南宋不但是造就民族英雄的时代,

也是孕育爱国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思想家的沃土。

2. 从政治制度上看,两宋时期是加强中央集权、“干强支弱”的时期

宋朝在建国之初,鉴于前朝藩镇割据、皇权削弱的经验教训,通过采取“强干弱支”政策,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这一制度在南宋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北宋王朝在中央权力上,实行军政、民政、财政“三权分立”,削弱宰相的权力与地位;在地方权力上,中央派遣知州、知县等地方官,将原节度使兼领的“支郡”收归中央直接管辖;在官僚机构上,实行官(官品)、职(头衔)、差遣(实权)三者分离制度;在财权上,设置转运使掌管各路财赋,将原藩镇把持的地方财权收归中央;在司法权上,设置县尉一职,将方镇节度使掌握的地方司法权收归中央;在军权上,实行禁军“三衙分掌”,使握兵权与调兵权分离、兵与将分离,将各州军权牢牢地控制在中央手里,从而加强了中央对政权、财权、军权等方面的全面控制。南宋继承了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这一系列措施,为维护国家内部统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尽管多次出现权相政治,但皇权仍旧稳定如故。

3. 从用人制度上看,南宋是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

两宋统治集团始终崇尚文治,尊重知识分子,重用文臣,提倡教育和养士,优待知识分子。与秦代“焚书坑儒”、汉代“罢黜百家”、明清“文字狱”相比,两宋时期可谓是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环境最为宽松的时期,客观上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政策措施表现在:

推行“崇尚文治”政策。宋王朝对文人士大夫采取了较为宽松宽容的态度,“欲以文化成天下”,对士大夫待之以礼,“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崇文抑武”大政方针。两宋政权将“右文”定为国策,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知识分子的思想十分活跃,参政议政的热情空前高涨,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宋代思想、学术、文化的大发展。正由于两宋重用文士、优待文士,不杀文臣,因而南宋时常有正直大臣敢于上书直谏,甚至批评朝政乃至皇帝的缺点,这与隋

参见何忠礼《论南宋定都杭州对当地经济文化的重大影响》,载《杭州研究》2007年第2期,第24页。

俞兆鹏:《南宋人才之盛及其原因》,载《杭州日报》2005年11月14日。

参见郭学信《试论两宋文化发展的历史特色》,载《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陶宗仪:《说郛》卷三九上,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986年。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丙寅”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2页。

唐、明清时期的动辄诛杀士大夫的政治状况大不相同。

采取“寒门入仕”政策。为了吸收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两宋对选才用人的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消除了魏晋以来士族门阀造成的影响。两宋科举取士几乎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再加上科举取士的名额不断增加,在社会各阶层中形成了“学而优则仕”之风。南宋时期,取士更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只要不是重刑罪犯,即使是工商、杂类、僧道、农民,甚至是杀猪宰牛的屠户,都可以应试授官。南宋的科举登第者多数为平民,如在宝祐四年(1256)登科的601名进士中,平民出身者就占了70%。

二、在经济上,不但要看到南宋连年岁贡不断、赋税沉重的状况,更要看到整个南宋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一面

人们历来有一种误解,认为南宋从立国之日起,就存在着从北宋带来的“积贫积弱”老毛病。确实,南宋王朝由于长期处于前金后蒙的威胁之下,迫使其不得不以加强皇权统治作为核心利益,在对外关系上,以牺牲本国的经济利益为代价,采取称臣、割地、赔款等手段来换取王朝政权的安定。正因为庞大的兵力和连年向金朝贡,加重了南宋王朝财政负担和民众经济负担,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宋的经济发展。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更应当看到,南宋时期,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给南宋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再加上统治者出台的一些积极措施,南宋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外贸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南宋经济繁荣主要体现在:

1. 从农业生产看,南宋出现了古代中国南粮北调的新格局

由于南宋政府十分注重水利的兴修,并采取鼓励垦荒的措施,加上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和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促进了流民复业和荒地开垦。人稠地少的两浙等平原地带,垦辟了众多的水田、圩田、梯田。曾经“几无人迹”的淮南地区也出现了“田野加辟”、“阡陌相望”的繁荣景象。南宋时期,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提高了两三倍,总体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唐代,有学者甚至将宋代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大幅提高称为

“农业革命”。“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就出现在南宋。元初,江浙行省虽然只是元十个行省中的一个,岁粮收入却占了全国的37.10%,江浙地区成了中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并出现了中国南粮北调的新格局。

2. 从手工业生产看,南宋达到了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新高峰

南宋时期,随着北方手工业者的大批南下和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使南方的手工业生产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是纺织业规模和技术都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金朝,南方自此成为了中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二是瓷器制造业中心从北方移至江南地区。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造型优美,有“饶玉”之称;临安官窑所造青瓷极其精美,为此杭州现在官窑原址建立了官窑博物馆,将这些精美的青瓷展现给世人;龙泉青瓷达到了烧制技术的新高峰,并大量出口。三是造船业空前发展。漕船、商船、游船、渔船,数量庞大,打造奇巧,富有创造性;海船所采用的多根桅杆,为前代所无;战船种类众多,功用齐全,在抗金和抗蒙元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从商业发展看,南宋开创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虽然宋代主导性的经济仍然是自然经济,但由于两宋时期冲破了历朝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观念的束缚,确立了“农商并重”国策,采取了惠商、恤商政策措施,使社会各阶层纷纷从事商业经营,商品经济呈现出划时代的发展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一是四通八达的商业网络。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出现了临安、建康(江苏南京)、成都等全国性的著名商业大都市,当时的临安已达16万户,人口最多时有150万—160万人,同时,还出现了50多个10万户以上的商业大城市,并涌现出一大批草市、墟市等定期集市和商业集镇,形成了“中心城市—市镇集市—边境贸易—海外市场”的通达商业网络。二是“市坊合一”的商业格局。两宋时期由于城市商业繁荣,冲破了长期以来作为商业贸易区的“市”与作为居民住宅区的“坊”

俞兆鹏:《南宋人才之盛及其原因》,载《杭州日报》2005年11月14日。

张邦炜:《瞻前顾后看宋代》,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五《杂志》,《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元)脱脱:《元史》卷九三《食货一·税粮》,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361页。

杨宽先生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一书中认为,南宋末年咸淳年间,临安府所属九县,按户籍,主客户共三十九万一千多户,一百二十四万多口;附郭的钱塘、仁和两县主客户共十八万六千多户,四十三万二千多口,占全府人口的三分之一。宋朝的“口”是男丁数,每户平均以五人计,约九十多万人。所驻屯的军队及其家属,估计有二十万人以上,总人口当在一百二十万人左右,包括城外郊区十万人和乡村十万人。

陈杰林:《南宋商业发展:特点与成因》,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分离的封闭式市坊制度,出现了住宅与店肆混合的“市坊合一”商业格局,街坊商家店铺林立,酒肆茶楼面街而立。从《梦粱录》和《武林旧事》的记载来看,南宋临安城内商业繁荣,甚至出现了夜市刚刚结束,早市又告兴起的繁荣景象。三是规模庞大的商品交易。南宋商品的交易量虽难考证,但从商税收入可窥见一斑。淳熙末(1174-1189)全国正赋收入6530万缗,占全国总收入30%以上,据此推测,南宋商品交易额在20000万缗以上,可见商品交易量之巨大。南宋商税加专卖收益超过农业税的收入,改变了宋以前历代王朝农业税赋占主要地位的局面。

4. 从海外贸易看,南宋开辟了古代中国东西方交流的新纪元

两宋期间,由于陆上“丝绸之路”隔断,东南方向海路成为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海外贸易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南宋海外贸易繁荣表现在:一是对外贸易港口众多。广州、泉州、临安、明州(浙江宁波)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与外洋通商的港口已近20个,还兴起了一大批港口城镇,形成了北起淮南/东海,中经杭州湾和福、漳、泉金三角,南到广州湾和琼州海峡的南宋万余里海岸线上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这种盛况不仅唐代未见,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现。二是贸易范围大为扩展。宋前,与我国通商的海外国家和地区约20处,主要集中在中南半岛和印尼群岛,而与南宋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至60个以上,范围从南洋(今南海)、西洋(今印度洋)直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三是出口商品附加值高。宋代不但外贸范围扩大、出口商品数量增加,而且进口商品以原材料与初级制品为主,而出口商品则以手工业制成品为主,附加值高。用附加值高的制成品交换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表明宋代外向型经济在发展程度上高于其外贸伙伴。

三、在文化上,不但要看到封闭保守、颓废安逸的一面,更要看到南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由于以宋高宗为首的妥协派大多患有“恐金病”,加之南宋要想收复北方失地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确实存在着许多困难,收复中原失地的战争,也几度受到挫折,因此在南宋统治集团中,往往笼罩着悲观失望、颓

废偷安的情绪。一些皇亲贵族,只要不是兵荒马乱,就热衷于享受山水之乐和口腹之欲,出现了软弱不争、贪图享受、胸无大志、意志消沉的“颓唐之风”。反映在一些文人士大夫的文化生活中,就是“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的华丽浮靡之风。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两宋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之一。近代的中国文化,其实皆脱胎于两宋文化。著名史学家邓广铭认为:“宋代文化发展所能达到的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日本学者则将宋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著名华裔学者刘子健认为:“此后中国近八百年来文化,是以南宋文化为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这主要体现在:

1. 南宋是古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巅峰时期

王国维指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宋学作为宋型文化的内核,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新巅峰。宋学流派纷呈,各臻其妙,大师迭出,群星璀璨,使南宋的思想文化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和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理学思想的形成。两宋统治者以文治国、以名劝学的政策,对当时的思想、学术及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最明显的一个标志是新儒学——理学思想的诞生。南宋是儒学各派互争雄长的时期,各学派互相论辩、互相补充,共同构筑起中国儒学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阶段。作为程朱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是继孔孟以来最杰出的儒家学者。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国家至上、百姓至上的精神,与孟子的“君轻民贵”思想一脉相承的。同时,两宋还倡导在儒家思想主导下的“儒佛道三教同设并行”,就是在“尊孔崇儒”的同时,对佛、道两教也持尊奉的态度。理学各家出入佛老;佛门也在学理上融合儒道;道教则从佛教中汲取养分,将其融入自身的养生思想,并吸纳佛教“因果轮回”思想与儒家“纲常伦理”学说。普通百姓“读儒书、拜佛祖、做斋醮”更是习以为常。两宋“三教合流”的文化策略迎合了时代的需要,使宋代儒生不同于以往之“终信一家、死守一经”,从而使得南宋在思想、文化领域均有重大突破与重大建树。

思想学术界学派林立。学派林立是南宋学术思想

陈杰林:《南宋商业发展:特点与成因》,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葛金芳:《南宋:走向开放型市场的重大转折》,载《杭州研究》2007年第2期,第50、50页。

邓广铭:《国际宋史研讨会开幕词》,载《国际宋史研讨论文集》,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页。

(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论文集》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刘子健:《代序——略论南宋的重要性》,载黄宽重主编《南宋史研究集》,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

发展的突出表现,也是当时学术界新流派勃兴的标志。在儒学复兴的思潮激荡下,尤其是在鼓励直言、自由议论的政策下,先后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之学,以吕祖谦、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等主要学派,开创了浙东学派的先河。南宋时期学派间互争雄长和欣欣向荣的景象,维持了近百年之久,形成了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盛况,为推动南宋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浙东事功学派极力推崇义利统一,强调“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认为只有农商并重,才能富民强国,实现国家中兴统一的目的。功利主义思想反映了当时人们希望发展南宋经济和收复北方失地的强烈愿望。

2. 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学艺术的鼎盛时期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南宋文学艺术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一是宋词的兴盛。宋代创造性地发展了“词”这一富有时代特征的文学形式。词的繁荣起始于北宋,鼎盛于南宋。南宋词不仅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而且艺术上更趋于成熟。辛弃疾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豪放词派的最高代表,也是南宋词坛第一人,与北宋词人苏东坡一样,同为宋词最杰出的代表。李清照是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易安体”,对后世影响很大。陆游既是著名的爱国诗人,也是南宋词坛的巨匠,他的词充满了奔放激昂的爱国主义感情,与辛弃疾一起把宋词推向了艺术高峰。二是宋诗的繁荣。宋诗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开拓了宋诗新境界,其影响直到清末民初。宋诗完全有资格在中国诗史上与唐诗双峰并峙,两水并流。三是话本的兴起。南宋话本小说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宋代话本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迎来了明清小说的繁荣局面。南宋还出现了以《沧浪诗话》为代表的具有现代审美特征的创新性的文学理论著作。四是南戏的出现。南宋初年,出现了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感染力的“戏文”,统称“南戏”。南宋戏文是元代杂剧的先驱,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成熟,为我国戏剧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五是绘画的高峰。宋代是中国绘画

史上的鼎盛时期,标志我国中古时期绘画高峰的出现。有研究者认为“吾国画法,至宋而始全”。宋代画家多达千人左右,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等人为代表的南宋著名画家,他们的作品在画坛至今仍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此外,南京的多位皇帝和后妃也都是绘画高手。南京绘画形式多样,山水、人物、花鸟等并盛于世,其中尤以山水画最为突出,它们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南宋画家称西湖景色最奇者有十,这就是著名的“西湖十景”的由来。宋代工艺美术造型、装饰与总体效果堪称中国工艺史上的典范,为明清工艺争相效仿的对象。此外,南宋的书法、雕塑、音乐、歌舞等也都有长足的发展。

3. 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兴盛时期

宋代统治者大力倡导学校教育,将“崇经办学”作为立国之本,使宋代的教育体制较之汉唐更加完备和发达。南宋官私学盛,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士族地主垄断教育的局面,使文化教育下移,教育更加大众化,适应了平民百姓对文化教育的需求,推动了文化的大普及,提高了全社会的文化素质,促进了南宋社会文化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在科举考试的推动下,南宋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并存,各类学校都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南宋各州县普遍设立了公立学校,其学校规模、学校条件、办学水平,较之北宋有了更大发展。由于理学家的竭力提倡和科举考试的需要,南宋地方书院得到了大发展,宋代共有书院397所,其中南宋占310所。南宋私塾村校遍及全国各地,学校教育由城镇延伸到了乡村,南宋教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程度。

4. 南宋是古代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

南宋以“尊重和提倡”的形式,鼓励知识分子重视历史,研究历史,“思考历代治乱之迹”。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南宋史学家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体,分别立目,完整地记载历史事件的纪事本末体;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创立了纲目体;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则开启了记述学术宗派史的学案体之先河。南宋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修史思想。南宋史学家不仅重视当代史的研究,而且力主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从历

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宋代之金石学》,载《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参见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57页。

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第158页。

何忠礼:《论南宋定都杭州对当地经济文化的重大影响》,载《杭州研究》2007年第2期,第18页。

陈寅恪:《陈垣 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陈垣 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0、238页。

史上寻找兴衰之源,以史培养爱国、有用的人才。这些都对后代的史学家有很大的启迪和教益。

四、在科技上,既要看到整个宋代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地位,也要看到南宋对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杰出贡献

宋代统治集团对在科学技术上有重要发明及创造、创新之人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为宋代科技发展与进步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宋朝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也是中国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最大的时期。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上都出现在宋朝,宋代的不少科技发明不仅在中国科技史上,而且在世界科技史上也号称第一。《梦溪笔谈》的作者北宋的沈括、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昇这两位钱塘(浙江杭州)人,都是中外公认的中国古代伟大科学巨匠。南宋的科技在北宋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发展,其科技成就在很多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主要表现在:

1. 南宋对中国古代“三大发明”的贡献

活字印刷术、指南针与火药三大发明,在南宋时期获得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实际应用。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始见于北宋末期,南宋时的指南针已从简单的指针,发展成为比较简易的罗盘针,并将它应用于航海上,这是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发明。李约瑟指出: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是“航海技艺方面的巨大改革”,“预示计量航海时代的来临”。中国古代火药和火药武器的大规模使用和推广也始自南宋。南宋出现的管形火器,是世界兵器史上十分重要的大事,近代的枪炮就是在这种原始的管形火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外,南宋还广泛使用威力巨大的火炮作战,充分反映了南宋火器制造技术的巨大进步。南宋开始推广使用活字印刷术,出现了目前世界上第一部活字印本。此外,南宋的造纸技术也更为发达,生产规模大为扩展,品种繁多,质量之高,近代也多不及。

2. 南宋在农业技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南宋陈旉所著的《农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有关南方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的农学著作,他是中国农学史上第一个提出土地利用规划技术的人。陈旉在《农书》中首先提出了土壤肥力论等多种土地的利用和改造之

法,并对搞好农业经营管理提出了卓越的见解。稻麦两熟制、水旱轮作制、“耕耙耨”耕作制,在南宋境内都得到了较好的推广。植物谱录在南宋也大量涌现。《橘录》是我国最早的柑橘专著;《菌谱》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菌类专著;《全芳备祖》是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比欧洲要早 300 多年;《梅谱》是我国最早的有关梅花的专著。

3. 南宋在制造技术上的高度成就

宋代冶金技术居世界最高水平,南宋对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有色金属的开采与冶炼方面,南宋发明了“冶银吹灰法”和“铜合金铁”冶炼法;在煤炭的开发利用上,南宋开始使用焦煤炼铁,而欧洲人是在 18 世纪时才发明了焦煤炼铁,是我国冶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南宋是我国纺织技术高度发展时期,特别是蚕桑丝绸生产,已形成了一整套从栽桑到成衣的过程,生产工具丰富,为明清的丝绸生产技术奠定了基础。南宋的丝纺织品、织造和染色技术在前代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南宋瓷器无论在胎质、釉料,还是在制作技术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南宋的造船、建筑、酿酒、地学、水利、天文历法、军器制造等方面技术水平,也都比过去有很大的进步。如现保存于杭州碑林的石刻《天文图》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全天星图,绘于南宋绍定二年(1229)的石刻《平江图》,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城市规划图,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苏州市博物馆。

4. 南宋在数学领域的巨大贡献

南宋数学不仅在中国数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数学史上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南宋杰出的数学家秦九韶撰写的《数学九章》提出的“正负开方术”,与现代求数学方程正根的方法基本一致,比西方早 500 多年。另一位杰出的数学家杨辉,编撰有《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乘除通变本末》、《田亩比类乘除捷法》、《续古摘奇算法》、《杨辉算法》等十余种数学著作,收录了不少我国现已失传的数学著作中的算题和算法。杨辉对级数求和的论述,使之成为继沈括之后世界上最早研究高阶等差级数的人。杨辉发明的“九归口诀”,不仅提高了运算速度和精确度,而且还对我国珠算的发明起到了重要作用。李约瑟把宋代称为“伟大的代数学家的时代”,认为“中国的代数学在宋代达到最高峰”。

5. 南宋在医药领域的重要贡献

[英]李约瑟:《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年,第115页。
参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1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273、284、287、292页。

南宋是中国法医学正式形成的时期。宋慈《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比西方早350余年。它不仅奠定了我国古代法医学的基础,而且被奉为我国古代“官司检验”的“金科玉律”,并对世界法医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南宋是中国针灸医学的极盛时期。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和闻人耆年《备急灸法》两书,皆集历代针灸学知识之大全,反映了当时针灸学的最高水平。南宋腧穴针灸铜人是针灸学上第一具教学、临床用的实物模型。陈自明所著的《外科精要》一书对指导外科的临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是著名的妇产科著作,直到明清时期仍被妇科医生奉为经典。朱瑞章的《卫生家宝产科方》,被称为“产科之荟萃,医家之指南”。无名氏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和刘昉的《幼幼新书》,汇集了宋以前在儿科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我国历史上较早的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儿科学著作。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是中国古代一部比较完备的方剂专著。

五、在社会上,不但看到南宋一些富豪官绅生活奢华、挥霍淫乐的一面,更要看到南宋政府关注民生、注重民生保障的一面

南宋社会生活的奢侈之风,既是南宋官僚地主腐朽的集中反映,也是南宋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缩影。我们不但看到南宋一些富豪官绅纵情声色、恣意挥霍的社会现象,更要看到南宋政府倡导善举、关注民生、同情民苦的客观事实。两宋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古代救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为宋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事业是从两宋开始的。同时,两宋时期随着土地依附关系的逐步解除和门阀制度的崩溃,逐渐冲破了以前士族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两宋社会结构开始调整重组,出现了各阶层之间经济地位升降更替、社会等级界限松动的现象,各阶层的价值取向趋近,促进社会各阶层的融合,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趋势明显。两宋社会的平民化,不仅体现在科举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取士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而且体现在官民之间身份可以相互转化,既可以由贵而贱,由贱而贵;贫富之间既可以由富而贫,也可以由贫而富。其具体表现在:

1. 南宋农民获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

两宋时期,租佃制普遍发展,这是古代专制社会中

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在租佃制下,地主招募客户耕种土地,客户只向地主交纳地租,而不必承担其他义务。客户契约期满后,有退佃起移的权利,且受到政府的保护,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按照宋朝的户籍制度,客户直接编入国家户籍,成为国家的正式编户,并承担国家某些赋役,而不再是地主的“私属”,因而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两宋农民在法律上可以自由迁徙,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南宋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农民可以自由地离土离乡,转向城市从事手工业或商业活动。

2. 南宋商人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

宋前历朝一直奉行“重农轻商”政策,士、农、工、商,商人居“四民”之末,受到社会的歧视。宋代商业已被视同农业,均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成为社会共识,使两宋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在南宋手工业作坊中,工匠主和工匠之间形成了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南宋手工业作坊中的雇佣制度,代替了原来带有强制性的指派和差人应役招募制度,雇佣劳动与强制性的劳役比较,工匠所受的人身束缚大为松弛,新的经济关系推动了南宋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3. 南宋市民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

“坊郭户”是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随着工商业的日益发展,宋政府将“坊郭户”单独“列籍定等”。“坊郭户”作为法定户名在两宋时期出现,标志着城市“市民阶层”的形成,市民阶层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南宋时期,还实行了募兵制,人们服役大多出自自愿,从而有效保障了城乡劳力稳定和社会安定,与唐代苛重的兵役相比,显然是一个进步。

4. 南宋社会保障制度更为完善

南宋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表现在:一是“荒政”制度。就是由政府无偿向灾民提供钱粮和衣物,或由政府将钱粮贷给灾民,或由政府将灾民暂时迁移到丰收区,或将粮食调拨到灾区,或动员富豪平价售粮,并在各州县较普遍地设置了“义仓”,以解决暂时的粮食短缺问题。同时,遇丰收之年,政府酌量提高谷价,大量收余,以避免谷贱伤农;遇荒饥之年,政府低价将存粮大量卖出,以照顾灾民。二是“养恤”制度。在临安等

邓小南:《宋代历史再认识》,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郭学信:《宋代俗文化发展探源》,载《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3期。

郭学信、张素音:《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特征及原因析论》,载《聊城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七《风土》,《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城市中,两宋政府针对不同的对象设立了不同的养恤机构。有赈济流落街头的老弱病残或贫穷潦倒乞丐的福田院,有收养孤寡等贫穷不能自存者的居养院,有收养并医治鳏寡孤独贫病不能自存之人的安济院,有收养社会弃子弃婴的慈幼局,等等。三是“义庄”制度。义庄主要由一些科举入仕的士大夫用其秩禄买田置办,义田一般出租,租金则用于赈养族人的生活。虽然义庄设置的最初动机在于为本宗族之私,但义庄的设置在一定范围内保障了族人的经济生活,对两宋官方的社会保障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南宋的社会保障政策与措施对倡导善举、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发挥了积极作用。

六、在历史地位上,既要看到南宋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地位,又要看到南宋对后世中国和世界的影 响

1. 南宋对东亚“儒学文化圈”和世界文明进程之影响

两宋的成就居于当时世界发展的顶峰,对周边国家和世界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南宋对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影响。南宋朱子学对东亚“儒学文化圈”各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至今仍然积淀在东亚各民族的文化心理中,对东亚现代化起着重要作用。在文化输入上,这些周边邻国对唐代文化主要是制度文化的模仿,而对两宋文化则侧重于精神文化的摄取,尤其是对南宋儒学、宗教、文学、艺术、政治制度的借鉴。南宋儒学文化传至东亚各国,与各国的学术思想和民族文化相融合,产生了朝鲜儒学、日本儒学、越南儒学等东亚儒学,形成了东亚“儒学文化圈”。这表明南宋儒学文化在东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对高丽、日本、越南等国学术文化与东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可以说是东亚文明发展中的一大奇观。同时,南宋儒学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和合理精神,在现代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家庭关系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和作用。如南宋儒学中的“信义”、“忠诚”、“中庸”、“和”、“义利并取”等价值观念,在现代东亚经济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也显而易见。

南宋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随着南宋海外贸易

的发展,与我国通商的海外国家与地区从宋前的 20 余个增至 60 个以上。海外贸易范围从宋前中南半岛和印尼群岛,扩大到西洋(今印度洋至红海)、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使雄踞于太平洋西岸的南宋帝国与印度洋地区北岸的阿拉伯帝国一起,构成了当时世界贸易圈的两大轴心。海上“丝绸之路”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鉴于此,美籍学者马润潮把宋代视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北宋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至南宋时,纸币开始在全国普遍使用。有学者将纸币的产生与大规模流通称为“金融革命”。纸币流通的意义远在金属铸币之上,表明我国在货币领域发展已走在世界前列。

两宋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宋代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宋的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大发明”的西传上。培根指出:“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在航行方面;由此产生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得上这三种机械发明。”马克思的评价则更高:“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两宋“三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决定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两宋科举考试制度也对法、美、英等西方国家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产生了直接作用和重要影响,被人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2. 南宋对中国古代与近代历史发展之影响

中外学者普遍认为:“这时的文化直至 20 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

南宋促进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两宋时期不仅出现了一大批大、中、小商业城市与集镇,而且形成了杭州、开封、成都等全国著名商业大都市,第一次出现了城市平民阶层,呈现了中国古

参见杜伟《略述两宋社会保障制度》,载《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 年第 1 期;陈国灿《南宋江南城市的公共事业与社会保障》,载《学术月刊》2002 年第 6 期。

葛金芳:《南宋:走向开放型市场的重大转折》,载《杭州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50 页。

参见张邦炜《瞻前顾后看宋代》,载《河北学刊》2006 年第 5 期。

[英]培根:《新工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103 页。

[德]马克思:《机械、自然力和科学应用》,南京:人民出版社,1978 年,第 67 页。

[美]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18 - 119 页。

代社会前所未有的时代开放性。南宋市民阶层的出现,世俗文化与世俗经济的形成与繁荣,意味着中国市民社会已具雏形,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平民化进程。正由于两宋时期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手工业发展、商业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发达、流通纸币出现、文官制度成熟等现象,美国、日本学者普遍把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

南宋促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由于南宋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有些学者甚至断言,宋代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西方有学者认为南宋已处在“经济革命时代”。随着宋室南下,南宋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使江南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南宋时期,全国经济重心完成了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历史性转移,我国经济形态自此逐渐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从内陆型经济转向海陆型经济,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如果没有明清的海禁和极端专制的封建统治,中国的近代化社会也许会更早地到来。

南宋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南宋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宋王朝虽然先后被同时代的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所征服,但无论是前金还是后蒙,在其思想文化上,都被南宋所代表的先进文化所征服,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10—13世纪,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时战时和、时分时合,使以农耕文化为载体的两宋文化迅速向北扩散播迁,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深受南宋所代表的先进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影响,表示出对南宋文化的认同、追随、仿效与移植,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先进的南宋文化,使其从文字到思想、从典章制度到风俗习惯均呈现出汉化趋势。南宋文化改变了这些民族的文化构成,提高了文化层位,加速了这些民族由落后走向文明、走向进步的进程,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中国北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

南宋奠定了理学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主导地位。理学的形成与发展,是南宋文化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大贡献。南宋理宗朝时,理学被钦定为封建正统思想和官方哲学,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并一直垄断元、明、清三代的思想和学术领域长达700余年,其影响之深广,在古代中国没有其他思想可以与之匹敌。同时,两宋时期开创了中国古代儒、佛、道“三教

合流”的文化格局。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同,南宋在大兴儒学的前提下,加大了对佛、道两教的扶持,出现了“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三教合一”的格局。自宋后,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基本延续了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文化格局。

两宋对中国后世王朝政权稳定的影响。两宋王朝虽然国土面积前不及汉唐,后不如元明清,却是中国封建史上立国时间最长的王朝。两宋王朝之所以在外患深重的威胁下保持长治久安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宋精于内治,形成了一系列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民族认同感,因此,自宋朝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深入人心,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地方严重分裂割据的局面。

3. 南宋对杭州城市发展之影响

正是南宋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发展,促成了京城临安的极度繁荣,使其成为12—13世纪最为繁华的世界大都会;也正是南宋带来的民族文化的大交流、生活方式的大融合、思想观念的大碰撞,形成了京城临安市民独特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性格特征、语言习惯。直到今天,杭州人所独有的文化特质、社会习俗、生活理念,都深深地烙上了南宋社会的历史印迹。

京城临安,一座巍峨壮丽的世界级的“华贵之城”。南宋朝廷立临安为行都,使杭州的城市性质与等级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大变化,从州府上升为国都,这是杭州城市发展的里程碑,杭州由此进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南宋统治者对临安城的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倾全国之人力、物力、财力加以精心营造。经过南宋诸帝持续的扩建和改建,南宋皇城布满了金碧辉煌、巍峨壮丽的宫殿,足可与北宋时的汴京城相媲美。同时,南宋对临安府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扩建,南宋御街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南宋都城临安,经过100多年的精心营建,已发展成为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成为当时亚洲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城市规模已名列十二三世纪时世界的首位。当时的杭州被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与此同时,12世纪的美洲和澳洲尚未被外部世界所发现,非洲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欧洲现有的主要国家尚未完全形成,罗马内部四分五裂,北欧各地海盗

张晓淮:《两宋文化转型的新诠释》,载《学海》2002年第4期。

参见葛金芳《南宋:走向开放型市场的重大转折》,载《杭州研究》2007年第2期,第49—50页。

参见虞云国《略论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地位》,《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参见何忠礼《论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杭州研究》2007年第2期。

肆虐,基辅大公爵(俄罗斯)刚刚形成。到了南宋后期(即13世纪中叶)临安人口曾达到150—160万人,此时,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也只有10万人口,作为世界最著名的大都会伦敦、巴黎,直至14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其人口也不过4万—6万人。仅从城市人口规模看,800年前的杭州就已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大城市。

京城临安,一座繁荣繁华的“地上天宫”。临安是全国最大的手工业生产中心。南宋临安工商业发达,手工业门类齐、制作精、分工细、规模大、档次高,造船、陶瓷、纺织、印刷、造纸等行业都建有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并有“四百一十四行”之说。临安是全国商业最为繁华的城市。临安城内城外集市与商行遍布,天街两侧商铺林立,早市夜市通宵达旦;城北运河榷槽相接、昼夜不舍,城南钱江两岸各地商贾海舶云集、桅杆林立。临安是璀璨夺目的文化名城。京城内先后集聚了李清照、朱熹、尤袤、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陈起等一批南宋著名的文化人。临安雕版印刷为全国之冠,杭刻书籍为我国宋版书之精华。城内设有全国最高的学府——太学,规模最为宏阔,与武学、宗学合称“三学”,临安的教育事业空前繁荣。城内文化娱乐业发达,瓦子数量、百戏名目、艺人人数、娱乐项目和场所设施等方面,也都是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临安不但是全国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今日杭州之所以能成为“人间天堂”,成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成为我国七大古都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南宋定都临安,得益南宋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

京城临安,一座南北荟萃、精致和谐的生活城市。北方人口的优势,使南下的中原文化全面渗透到本土的吴越文化之中,形成了临安独特的社会生活习俗,并影响至今。临安的社会是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和谐相处的社会,临安的文化是南北文化交融、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临安的生活是中原风俗与江南民俗相互融合的产物。总之,南宋临安是一座兼容并蓄、精致和谐的生活城市。其表现为:一是南北交融的语言。经过南宋100多年流行,北方话逐渐融合到吴越方言之中,形成了南北交融的“南宋官话”。有学者指出:“越中方言受了北方话的影响,明显地反映在今日带有‘官话’色彩的杭州话里。”二是南北荟萃的饮食。自南宋起,杭人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从以稻米为主,发展到米、面皆食。“南料北烹”美食佳肴,结合西湖文采,形成了具

有鲜明特色的“杭帮菜系”,而成为中国古代菜肴的一个新的高峰。丰富美味的饮食,致使临安人形成了追求美食美味的饮食之风。三是精致精美的物产。南宋时期,在临安无论是建筑寺观,还是园林别墅、亭台楼阁和小桥流水,无不体现了江南的精细精致,更有陶瓷、丝绸、扇子、剪刀、雨伞等工艺品,做工讲究、小巧精致。四是休闲安逸的生活。城市的繁华与西湖的秀美,使大多临安人沉醉于歌舞升平与湖山之乐中,在辛劳之后讲究吃喝玩乐、神聊闲谈、琴棋书画、花鸟鱼虫,体现了临安人求精致、讲安逸、会休闲的生活特点,也反映了临安市民注重生活与劳作结合的城市生活特色,反映了临安文化的生活化与世俗化,并融入今日杭州人的生活观念中。

4. 借鉴南宋“体恤民生”的某些仁义之举,努力将今天的杭州建设成为一个全民共享的“生活品质之城”

南宋社会关注民生、同情民苦的仁义之举,尤其是针对不同人群建立的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生活品质之城”的今天,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建设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生活品质之城”,既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又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要使“发展为人民、发展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成效让人民检验”理念落到实处,就必须把老百姓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以群众呼声为第一信号,以群众利益为第一追求,以群众满意为第一标准,树立起“亲民党委”、“民本政府”的良好形象。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理念,既要关注城市居民,又要关注农村居民;既要关注本地居民,又要关注外来创业务工人员;既要关注全体市民生活品质的整体提高,更要特别关注困难群众、弱势群体、低收入阶层生活品质的明显改善。要始终关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安危冷暖、生老病死,让老百姓能就业、有保障,行得便捷、住得宽敞,买得放心、用得舒心,办得了事、办得好事,拥有安全感、安居又乐业,让全体市民共创生活品质、共享品质生活。

5. 整合南宋“安逸闲适”的环境资源,推进杭州“东方休闲之都”和国际旅游休闲中心建设

杭州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环境,经过南宋100多年来固江堤、疏西湖、治内河、凿新井、建宫城、造御街、设瓦子、引百戏等多方面的措施,形成都城左江(钱塘

参见何亮亮《从“南海”一号看中华复兴》,载《文汇报》2008年1月6日。

参见何忠礼《论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载《杭州研究》2007年第2期。

参见徐吉军《论南宋定都杭州对当地经济文化的重大影响》,载《杭州研究》2007年第2期。

江)右湖(西湖)、内河(市区河道)外河(京杭运河)的格局,使杭州的生态环境、旅游环境、休闲环境大为改观,极大地丰富了杭州的旅游资源。南宋为我们留下的不但是一块“南宋古都”的“金字招牌”,还留下了“安逸闲适”的休闲环境和休闲氛围。在“三面云山一面城”的独特环境里,集中了江、河、湖、溪与西湖群山,出现了大批的观光游览景点,并形成了著名的“西湖十景”。沿湖、沿河、沿街的茶肆酒楼,鳞次栉比、生意兴隆;官私酒楼、大小餐馆充满着“南料北烹”的杭邦菜肴和各地名肴;大街小巷布满大小馆舍旅店,是外地游客与应考士子的休息场所。同时,临安娱乐活动丰富多彩,节庆活动繁多。独特的自然山水、休闲的环境氛围,使临安人注重生活环境、讲究生活质量、追求生活乐趣。不但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纵情山水、赏花品茗,过着“高贵奢华”的休闲生活,而且文人士大夫交接土朋、寄情适趣,热衷“高雅脱俗”的休闲生活;就是普通百姓也往往会带妻携子、泛舟游湖,享受“人伦亲情”的山水之乐。

今天的杭州人懂生活、会休闲,讲究生活质量,追求生活品质,都可以从南宋临安人闲情逸致的生活态度中找到印迹。今天的杭州正在推进新城建设、老城更新、环境保护、街区改善等工程,都可以从南宋临安

对左江右湖、内河外河的治理和皇城街坊、园林建筑的建设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杭州要打造“东方休闲之都”,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建设国际旅游休闲中心,就必须重振“南宋古都”品牌,充分挖掘南宋文化遗产,珍惜杭州为数不多的地上南宋遗迹。进一步实施好西湖、西溪、运河、市区河道等综合保护工程;推进“南宋御街”——中山路有机更新,以展示杭州自南宋以来的传统商业文化;加强对南宋“八卦田”景区的保护与利用,以展示南宋皇帝“与民同耕”的怀古场景;加强对南宋官窑遗址的保护与利用,以展示南宋杭州物产的精致与精美;加强对南宋皇城遗址和太庙遗址的保护与利用,以展示昔日南宋京城的繁荣与辉煌。进入21世纪的杭州,不但要保护利用好南宋留下的“三面云山一面城”的“西湖时代”,更要以“大气开放”的宏大气魄,努力建设好“一主三副六组团六条生态带”的大都市空间格局,形成“一江春水穿城过”的“钱塘江时代”,实现具有千年古都神韵的文化名城与具有大都市风采的现代化新城同城辉映。

特邀编辑:徐吉军